

·调查与思考·

农村地区外出务工潮对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影响

牛 建 林

【摘 要】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与县级主要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分析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现象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辍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地区同龄人外出务工现象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辍学具有吸引与示范作用。一个区县同龄人外出务工的比例越高,在校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可能性越高;与完成义务教育者相比,初中辍学者更有可能外出务工。与同龄人外出的影响不同,家人外出有助于降低农村中小学生学习辍学的风险,促进其接受较高的教育。

【关键词】义务教育 辍学 教育决策 外出务工

【作 者】牛建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居民的教育状况明显改善,全国大部分地区义务教育普及率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大幅提升,但不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仍存在辍学现象。据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国每年有上百万中小学生辍学。以 2008 年为例,全国仅初中阶段辍学的学生就有 140 万之多(国家统计局,2010)。现有研究对辍学现象的成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曹晶,2007;陈国华,2009;郭浩,2007;蒋先龙,2002;龙成章,2000;杨润勇,2007;杨润勇、王颖,2004;张红霞、方冠群,2012;周潇,2011)。然而,这些研究相对忽视了近几十年来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所创造的大量低端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深刻影响。首先,尽管不少研究指出,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存在短期性行为,但迄今为止,尚没有研究系统考察这种短期性行为。对于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相关的教育决策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农村地区外出务工现象对中小学生学习辍学风险的潜在影响,目前尚缺乏实证检验。其次,现有多数研究利用定性访谈资料或小范围的区域性调查数据,尽管这些数据资料为理解考察地区的辍学现象提供了重要素材,但这些研究难以系统揭示各地区辍学现象的差异和影响辍学风险的宏微观因素。最后,现有多数研究侧重考察辍学者的内部特征,相对忽视了辍学者和继续接受教育者的对比,对农村家庭和个人教育决策行为的关注不足。这一研究现状不利于系统深入地理解农村地区居高不下的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现

象。为了系统考察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现象的成因、检验过去30年中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潮对中小学生辍学的影响,本文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县级主要社会经济统计资料,通过建立多层模型对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农村居民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数据、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方法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设计,在除西藏、青海、宁夏外的28个省份逐层抽取县(区)级样本(共125个)、乡镇/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和家庭样本。最后,在抽中的家庭户(约10000个)中,随机抽取1名18~69岁(即1937~1988年出生)的调查对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不仅收集了关于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的较为丰富的数据资料,而且包括了个人的具体教育经历、最高学历完成情况和成长过程中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的回顾性信息。本文选取1971~1988年出生、有过正规受教育经历的样本作为分析对象。受义务教育法及其他相关政策制度的影响,近二三十年来,农村地区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学龄人口比例很低,且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特征(如残疾等)。因而,本文以有过正规教育经历(即曾进入辍学风险的“历险人群”)的农村学龄人口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这些个体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风险。分析样本中,除极少数个案(低于0.5%)外,绝大多数被访者均已结束义务教育阶段对应的教育经历(即已结束个人教育过程或在高中及以上教育阶段“在校”),因而能够提供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决策结果的完整信息。对于少

表1 调查样本描述性统计(n=1077)

变 量	百分比	变 量	百分比
出生队列		其他	15.08
1983~1988年	23.58	18岁时父亲教育程度	
1977~1982年	30.36	小学及以下	73.86
1971~1976年	46.05	初中	19.51
男性	46.15	高中及以上	6.63
女性	53.85	10岁时有兄弟	71.12
汉族	90.06	10岁时有姐妹	69.73
少数民族	9.94	10岁时兄弟姐妹中排行	
最终教育状况		最大	24.88
未完成义务教育	37.14	最小	36.49
仅完成义务教育	47.63	其他(包括独生子女)	38.63
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	15.23	上学期间家人曾外出务工	3.62
18岁时父亲职业			
农民	84.92		

注:兄弟姐妹数量均值为2.32,标准差为1.57。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数仍在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被访者,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最终的教育决策结果尚未观察到(右删失),本文统一按信息缺失处理。由于这些被访者的数量非常小,对研究结果影响可以忽略。样本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本文使用的县级数据主要来源于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7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根据该数据计算的各县主要人口和社会经济指标如表2所示。

由表 1 可见,分析样本中年轻队列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这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有关;女性所占比例略高于男性。样本的最终教育状况以仅完成义务教育为主,超过 1/3 的样本未完成义务教育。样本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小学及以下,职业以农民为主;

多数被访者有兄弟或姐妹。在被访者上学期间,父母或兄弟姐妹曾外出务工的约占 3.6%。从表 2 可以看出,县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状况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1990 年,大约有 2/3 的样本县 10~17 岁人口不在校的比例在 16%~37%之间。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 10~17 岁人口接受教育的状况及该年龄段人口全职参与劳动的可能性。

(二) 义务教育阶段辍学情况

从图 1 可见,年轻队列中,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比例明显较低,仅完成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后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均较高。尽管如此,分析样本中最年轻(1983~1988 年出生)队列仍有 18%的男性和 31%的女性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与男性相比,各队列女性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比例均更高,而在义务教育以外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则明显更低。

尽管年轻队列的被访者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风险相对较低,但这一队列差异主要来自于年轻队列小学阶段辍学风险的明显下降。图 2 展示了各队列样本在义务教育阶段累计辍学的比例及其具体分布情况。从中可见,无论男女,在初中以下阶段的辍学风险(包括小学辍学和仅完成小学)随队列明显下降,但初中阶段的辍学风险却呈现相反的变化特征,其中女性尤为明显。此外,分析样本显示,各队列高中阶段辍学的比例均低于 3%。说明农村地区学龄人口辍学现象主要发生在义务教育阶

表 2 地区层次(县级)社会经济状况(n=76)

变 量	百分比	变 量	均值
东部地区	31.58	非农人口比重	15.28(8.13)
中部地区	43.42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32.10(8.96)
西部地区	25.0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1.19(0.95)
山区	35.53	恩格尔系数	42.00(8.81)
丘陵	19.74	中学阶段生师比	17.77(2.54)
平原	44.73	10~17 岁人口不在校比例	26.66(10.70)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根据 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2007 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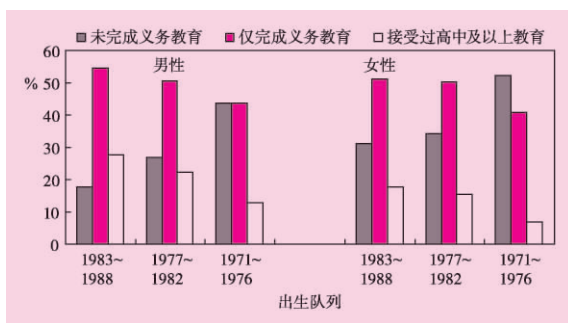


图 1 2006 年 18~35 岁农村青年教育完成状况
资料来源: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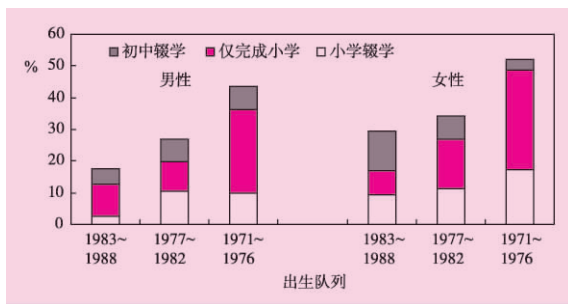


图 2 2006 年 18~35 岁农村青年在义务教育阶段累计辍学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表3 2006年18~35岁农村青年在初中或高中的学历完成情况与外出务工经历

	曾外出务工(%)	样本量	卡方检验 p 值
初中			
辍学	52.78	72	0.049
毕业或肄业	40.55	513	
高中			
辍学	40.00	10	0.920
毕业或肄业	38.33	60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段,其中初中辍学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分析样本中,初中阶段辍学者在结束教育后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比例显著高于初中毕业或肄业者(见表3)。相比之下,高中阶段辍学者在结束教育后是否外出务工与高中毕业生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初中阶段)辍学者更可能外出务工。

考虑到中国义务教育的免费性和强制性特点,被访者选择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有可能与非农就业机会的吸引、当地同龄人外出务工现象的示范效应有关。为系统检验农村地区外出务工现象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辍学风险的潜在影响,本文以下部分通过构建和拟合多元模型,重点考察了农村地区同龄人外出务工与家人外出现象对在校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决策的影响。

考虑到中国义务教育的免费性和

(三) 模型方法

为考察分析样本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风险及其影响因素,检验其户籍所在地外出务工现象对其辍学风险的影响,本文以分析样本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决策结果为因变量。具体而言,该因变量为分类测度,具体量化测度方式为:“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①($Y=1$)、“仅完成义务教育”($Y=2$)、“完成义务教育后继续升学”($Y=3$)。

由于中国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资源配置状况存在差异,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地区实施分级办学制度,农村中小学教育主要由县级财政支付。因此,各县教育状况存在系统性差异。在分析样本的教育决策结果时,有必要考虑县级层次的群组效应。鉴于此,本文使用多层多项logit模型,在控制个人及县级主要社会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检验农村地区学龄人口不在校比例(P_{out})与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现象($Fmig$)对被访者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决策结果的影响。本文设定的具体模型如下(为简便起见,个人层次和县级层次的下标省略):

$$\begin{aligned} \text{第一层(个人层次)}: \log \left[\frac{P(Y=1)}{P(Y=3)} \right] &= \alpha^{(1)} + \beta_1^{(1)} Fmig + \sum_{k=2}^K \beta_k^{(1)} X_k \\ \log \left[\frac{P(Y=2)}{P(Y=3)} \right] &= \alpha^{(2)} + \beta_1^{(2)} Fmig + \sum_{k=2}^K \beta_k^{(2)} X_k \end{aligned}$$

① 根据义务教育法及相关的制度规定,学龄人口在义务教育阶段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该权利不受客观的、外部竞争性等因素的限制。因此,本研究将曾进入义务教育(小学或初中)、但未完成该阶段教育的被访者统一界定为“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以此来反映在义务教育阶段因自身选择、非竞争性因素而失学的现象。具体而言,这类被访者包括在小学辍学、完成小学教育但未继续升学、以及在初中阶段辍学者。

$$\text{第二层(县级层次)} \quad \alpha^{(1)} = \gamma_{00}^{(1)} + \gamma_{01}^{(1)} Pout + \sum_{l=2}^L \gamma_{0l}^{(1)} Z_l + \mu_0^{(1)}$$

$$\alpha^{(2)} = \gamma_{00}^{(2)} + \gamma_{01}^{(2)} Pout + \sum_{l=2}^L \gamma_{0l}^{(2)} Z_l + \mu_0^{(2)}$$

其中,在模型第一层, $\alpha^{(1)}$ 、 $\beta_1^{(1)}$ 、 $\beta_k^{(1)}$ 和 $\alpha^{(2)}$ 、 $\beta_1^{(2)}$ 、 $\beta_k^{(2)}$ 分别为个人层次的截距、自变量 $Fmig$ 及第 k 个控制变量 X_k 对应的模型系数,其中上标(1)、(2)分别用来代表因变量的相应类别。在模型第二层, $\gamma_{00}^{(1)}$ 、 $\gamma_{01}^{(1)}$ 、 $\gamma_{0l}^{(1)}$ 和 $\gamma_{00}^{(2)}$ 、 $\gamma_{01}^{(2)}$ 、 $\gamma_{0l}^{(2)}$ 分别为固定截距、县级自变量 $Pout$ 和第 l 个县级控制变量 Z_l 的效应系数, $\mu_0^{(1)}$ 和 $\mu_0^{(2)}$ 为随机截距效应。

农村地区的外出务工潮主要由青壮年人口组成,外出务工者既包括不在学的学龄人口,也包括其父母或兄弟姐妹。因此,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各县 10~17 岁人口外出务工的比例和被访者家人外出务工的经历。使用 1990 年各县 10~17 岁人口不在校比例来近似测度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各县 10~17 岁人口外出务工的普遍程度^①;使用被访者上学期间父母或兄弟姐妹是否外出务工来测度家人的外出务工情况。个人层次的控制变量包括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中兄弟姐妹的数量及其构成、本人年龄、性别、民族等因素。县级层次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中学阶段生师比、县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非农业人口比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等。

二、分析结果

多层多项 logit 模型结果显示(见表 4、表 5),被访者的教育决策结果存在显著的县级群组效应,即同一区县的被访者的辍学风险、升学可能性等教育结果更为接近,不同区县的被访者相应教育决策结果差异显著。无条件随机截距模型中未包括任何解释变量,仅用以检验因变量的方差构成及群组效应的显著性。对比两个模型对应的随机效应可见,模型 1 中考虑了个人及县级主要社会经济变量后,因变量的两个对数发生比的随机效应方差显著下降。其中,“仅完成义务教育”与“在义务教育后继续接受教育”的发生比在各县之间差异已不再显著。

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县级 10~17 岁人口不在校比例每增加 1 个百分点,被

① 本文选用 1990 年 10~17 岁人口的不在校比例,主要原因是:(1)10~17 岁大致对应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的学龄阶段,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已进入或即将进入劳动年龄,从体能上开始具备生产劳动的条件,其不在校更有可能与从事或准备从事生产劳动有关;(2)选择 1990 年的截面数据而非时间序列数据,主要是为了避免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同龄人不在校比例的时间序列数据受被访者在校情况变化的影响,因而无法有效规避内生性问题。(3)尽管各县 10~17 岁人口不在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县的教育发展状况,但该比例的高低决定着各县学龄人口全职参加生产活动、贡献劳动力的可能性大小。因而,在县级相关数据资料有限的情况下,该变量不失为对各县学龄人口外出务工工程度的有效测度。

表4 多层多项 logit 模型随机截距效应拟合结果

	义务教育阶段辍学		仅完成义务教育	
	$Var(\mu_0^{(1)})$	卡方统计量(自由度)	$Var(\mu_0^{(2)})$	卡方统计量(自由度)
模型0	1.12***	175.1(75)	0.35**	115.0(75)
模型1	0.54**	101.9(67)	0.09	74.5(67)

注:个人层次样本量=1077,县级样本量=76。**p<0.01,***p<0.001。

学龄儿童外出务工现象对在校学生辍学、外出务工起到了重要的吸引和示范作用。究其原因,过去30年,受改革开放、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中国不少地区乡镇企业和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兴起历史性地改变了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决策环境。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知识和技术要求较低,这就为未完成基础教育或中等教育者实现非农就业提供了可能,客观上增加了上学的机会成本;而农村教育质量偏低、教育预期回报率不高的现实也对农村地区学龄人口尽早结束教育、外出务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表5 多层多项 logit 模型固定效应拟合结果

	义务教育阶段辍学		仅完成义务教育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固定截距	-0.89	0.55	0.82	0.44
10~17岁人口不在校比例	0.04*	0.02	0.01	0.01
中学阶段生师比	-0.003	0.07	-0.12*	0.05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0.02	0.02	-0.02*	0.01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0.46*	0.23	-0.49***	0.12
地貌特征(平原或丘陵)				
山区	0.78*	0.36	0.26	0.33
家人曾外出	-1.13+	0.66	-0.73+	0.38
性别(男性)				
女性	0.95***	0.23	0.52**	0.20
民族(汉族)				
少数民族	0.95+	0.53	1.46*	0.61
父亲教育(小学及以下)				
初中	-0.82***	0.23	-0.51*	0.21
高中及以上	-1.30**	0.42	-0.40	0.35
父亲职业(非农职业)				
农民	0.39	0.31	0.21	0.27
出生队列(1983~1988年)				
1971~1976年	1.01**	0.31	0.03	0.26
1977~1982年	-0.004	0.28	-0.30	0.25

注:除表中所列变量外,模型1同时控制了兄弟姐妹数量、在兄弟姐妹中排行、兄弟姐妹构成及县级非农人口比重、恩格尔系数、地区虚拟变量。括号内为参照组。+p<0.1,*p<0.05,**p<0.01,***p<0.001。

访者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相对于“完成义务教育并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可能性平均上升约5% $[\exp(0.04)-1]$ 。

值得注意的是,县级10~17岁人口不在校比例对被访者是否“仅完成义务教育”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完成义务教育后是否继续升学的教育决策更多地受升学考试竞争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个人和家庭选择的主动性相对较小。与之相比,是否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则更多地是个人及其家庭在权衡继续接受教育的预期收益、机会成本及辍学务工预期收益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这一决策过程的自主性更为明显,因而也更可能受当地青少年务工现象及与之相联系的(短期)经济利益的吸引。

与同龄人外出务工的影响不同,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学龄人口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或在完成义务教育后终止教育均具有重要的负向效应。上学期间父母或兄弟姐妹曾外出务工的,被访者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可能性(相对于完成义务教育并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下降近 70% $[1 - \exp(-1.13)]$;在完成义务教育后终止教育的可能性下降约 52% $[1 - \exp(-0.73)]$ 。由此可见,与农村社区同龄人外出务工现象的影响不同,家人外出务工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完成义务教育、继续升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可能反映了家人外出务工对在校生辍学务工、增加家庭经济资源的替代效应,以及家庭内部关于外出务工决策与子女教育决策的相依性。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高的,往往通过家庭内部决策和安排为这些子女提供教育支持和保障,通过父母本人或其他子女外出务工来增加经济收入、降低家庭经济约束,以便保护和促进这些子女完成义务教育并接受更高的教育。

除同龄人外出及家人外出务工的影响外,模型 1 的控制变量对被访者的辍学风险也存在重要影响。与男性相比,农村女性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可能性更高,在完成义务教育后终止教育的可能性也相对更高。少数民族在校生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可能性更高,义务教育后继续升学的可能性更低。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可能性越低,但这一关系对于子女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是否继续接受教育并不完全成立。与年轻出生队列相比,较早出生队列(1971~1976年)的被访者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可能性显著更高,但各队列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是否继续升学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一个区县的人均生产总值越高,学龄人口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可能性越低、完成义务教育后继续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越高。相对于平原和丘陵地区,山区学龄人口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可能性显著更高,但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是否继续接受教育的决策不存在显著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区县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越高,学龄人口在义务教育后终止教育的可能性(与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相比)越低;但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可能性并不显著低于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可能性。由此可见,一个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改善地区经济状况,有利于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提高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但与此同时,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受这些就业机会的吸引,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现象可能并不能有效减少。

总体而言,个人及县级主要社会经济等特征对农村地区学龄人口的教育决策存在重要影响。与义务教育的免费性、强制性等特征相联系,学龄人口是否辍学受当地同龄人务工现象的吸引作用更为显著。相比之下,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变量之后,该因素对农村地区学龄人口完成义务教育后是否继续升学没有显著影响。与农村地区同龄人务工现象的影响相反,家人外出务工对学龄人口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降低辍学风险、促进继续升学,这一作用既可能通过改善家庭经济条件、降低经济约束实现,也可能通过家庭教育理念的改变而发挥作用。

三、结 语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发现:(1)县级学龄人口务工现象(不在校比例)对在校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具有重要的正向效应。农村学龄人口的外出务工现象通过吸引和示范作用,使更多的同龄人及早结束教育,加入务工队伍。(2)与农村地区同龄人外出务工现象的影响不同,上学期间家人外出务工对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辍学具有负向效应。即父母或兄弟姐妹外出务工对学龄人口完成义务教育、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尽管中国义务教育法已推行20余年,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现象仍比较突出。这一现状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现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巩固,而且也直接制约着农村地区人力资源的发展。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降低农村地区学龄人口辍学发生率、改善农村居民的教育发展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决策环境。一方面要提高农村居民的预期教育成果和收益,另一方面要降低农村在校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历年的统计资料相对缺乏县级统计数据,这在客观上限制了我们对区县级社会经济特征与制度性差异对青少年教育决策、教育发展的影响的深入研究。此外,以往的统计资料与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数据对辍学现象缺乏详细信息。例如,现有统计资料中极少区分不同学历完成情况的人口就业状况的信息,而现有的微观调查数据也很少收集辍学者的辍学时间及辍学前后个人与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文对外出务工现象与辍学关系进行更为直接的分析。因此,相关的研究问题仍有待在数据条件改善的情况下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曹晶(2007):《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失衡:转型期农村教育的主要危机》,《教育科学》,第1期。
2. 陈国华(2009):《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的原因分析——文化资本的视角》,《现代教育论丛》,第12期。
3. 郭浩(2007):《课程视角:贫困农村地区初中学生辍学原因分析——一所农村初级中学的个案研究》,《教育导刊》,第1期。
4. 国家统计局(20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5. 国家统计局(2008):《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
6. 蒋先龙(2002):《民族地区中小學生辍学及对策浅析》,《当代教育论坛》,第2期。
7. 龙成章(2000):《控制初中生辍学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普九”的关键》,《中国民族教育》,第3期。
8. 杨润勇(2007):《农村地区初中学生辍学现象产生的根源研究》,《教育实践与研究(中学版)》,第9期。
9. 杨润勇、王颖(2004):《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的现状调查和规律研究——小康农村地区初中学生辍学现象研究之一》,《教育理论与实践》,第1期。
10. 张红霞、方冠群(2012):《论转型期农村教育的困境——农村青少年辍学问题的探讨》,《继续教育研究》,第3期。
11. 周潇(2011):《农村青少年辍学现象再思考:农民流动的视角》,《青年研究》,第6期。

(责任编辑:李玉柱)

and high order services oriented, whil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in Middle and West China cities are more complicated. Fourthly, investments are still strong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urban float- in population growth, especially in East Coastal and developed cities.

Lewis Turning Point from Dual Economy Transition and Dynamic Evolutionary Point of View

Zhang Guiwen ·59·

Scholars feel difficult to reach consensus about whether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has come at present. The key reason is that we neglect the study on basic theory of dual economy and fail to understand the specialty of China's dual economic transition. If we are able to, from dynamic evolutionary point of view, properly recognize the process of dual economic transition as a course of dualistic transitions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 and fully recognize the specialty of China's dual transition, we will find that Lewis turning point is only a threshold of transition from dual economy to modern integrated economy. Passing the threshold show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got rid of 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and realized the leap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after two big sectors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begin to follow commercial principles. Competition for labors recruiting results in the failure of wage iron law and classical saving principles. Through defining the gap between deficiency point and commercialized point as Lewis turning zone, referenc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we are able to assert that China has entered the Lewis turning zone even without using mathematic statistics and econometric examinations.

Estimation on Fertility Level in China 2000–2010 Preliminary Study Based on the 2010 Population Census

Zhu Qin ·68·

This paper estimates fertility level in China during 2000- 2010 by using the population- shift algorithm and the survival backward method based on the 2010 population census, and then compares the results with those of the census and surveys over the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2000 census undercounted 20.56 million people aged 0- 14, among which the females were much more than the males, and the children aged 1 and 7 were more undercounted than other age groups. The number of reproductive- age- women increased by 7.86% in the past decade, and women aged 35- 49, a lower reproductive group, increased by more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groups of reproductive age.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experienced first from reducing to rising then being settled with a slight downward tendency. The average total fertility rate was 1.48 over the years of 2000- 2009.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undercount of far younger population in the 2000 census would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severe underestimation on fertility rate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the average gap of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between estimations by this study and the results from the census and surveys is 0. 09.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low fertility rate, shrinking and aging reproductive- age- women, change of age structure in China would be sharp in the future, and an effective policy response would be necessary and urgent.

The Effect of Kinship Network on the Difference in Welfare among Migrants in North–East China(1845–1934)

Li Nan ·78·

Using a unique survey on actual village in the 1930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kinship network as one of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migration network on the difference in welfare among migrants in North- east China. By constructing series econometric models, our finding is that: kinship network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the welfare of migrant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lead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economic status or welfare among the migrants. In addition, our estimates also indicate that kinship network promote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for those within it. This study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role of kinship network in Northeast migration in the modern China, but also provides the confirmed evidence to reveal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kinship network in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Social Insurance of Migr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Informal Employment Perspective

Zhang Guoying Wu Shaolong ·88·

With focus on informal employment,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Labor Contract Law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surance, and the investmen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The variables of individual have greater effects on the protection insurance (old- age insuranc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have weaker impact on production insurance (medical insurance, injury insurance and maternity insurance). The variables of enterprise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and signing a labor contract is the most powerful factor that will affect migrant workers' insurance. Therefore the interventions of Migrant worker policy should focus on contract signing, skills training and policy favoring to the labor.

A Study on Meaning and Number of Land–Lost Peasants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

Li Mingyue Hu Zhuzhi ·95·

The absence of clear definition of land- lost peasants leads to confused estimation of the number.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notion of land- lost peasants should be caught on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dimensions: time, identity, acreage and ownership. On this basis, according to farmland, agricultural land, collective land, the study estimates the number of land- lost peasants in Guangdong up to Year 2008.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land- lost peasants has been undercounted, and that Dynamic Balance Policy of the Total Amount of Farmland has been little effective. The Problem of land- lost peasants is more serious than what has been anticipated, thus the government must hav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to help resettle the land- lost peasants properly.

Impacts of Labor Migration on Compulsory Schooling Dropout in Rural China

Niu Jianlin ·103·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CGSS 2006 and county- level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labor migration on the dropouts of school- age children du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since the 1980s in rural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ers' migration encourages school- age children to dropout du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teenagers who drop out from junior middle school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labor migrants. To the contrary, the migration of family members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f protecting school- age children from dropping out du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their chance of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